

中共特科女战士周惠年(1) ◆ 孙月红

初到上海,在中央交通局长家当“佣人”

周惠年跟着一位男交通员从河南鸡公山逃到上海的时候,是20世纪20年代末。那年周惠年刚刚年满18岁,但她已经是一位历经磨难的中共地下党员了。15岁那年,她就自作主张把长长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在家乡河南信阳宣传北伐、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并退掉了父母给她订的娃娃亲。她16岁加入共青团,为党做交通,送信、送文件、印传单、买菜、买纸。17岁那年她在潢川被捕,被软禁在宪兵连。宪兵连连长田池生大概看她年纪比较小,就没有太难为她,关了三个月后就把她释放了。党组织很快将她调回信阳县委机关工作,她却向组织申请去基层搞工人运动,组织同意了。18岁的周惠年到了信阳的工厂里当起了工人,搞起了工人运动。在一次罢工后,她与同事外出贴传单时被敌人发现,暴露了身份。信阳待不下去了,她就连夜出逃,在火车站遇到了自己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周惠年顺利逃出了信阳。

那是1929年的初秋。此时中共中央交通局建立不久,正在向各区委寻找可靠的干部,而且特别需要年轻的女同志,以建立交通站。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与上海的交通中,缺一个住机关的女交通员。地下党领导人郭述申认为周惠年很适合这项工作,她虽然年纪小,但革命坚定,又聪明伶俐,遂派她去了上海中央交通局。党组织派了一个男交通员到广水,接周惠年一同去上海。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上海。

由于缺乏特科工作经验,以及文化程度的限制,周惠年暂时被分配到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吴德峰家中当“佣人”。这是周惠年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第一站。吴家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扮演的是一个年轻“老妈子”的角色。当时吴德峰是中央交通局局长。

周惠年曾被陈云赞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被周恩来赞扬为“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她是一名中共特科的特工,是一名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特科“红队”的女战士。

为了工作方便,吴德峰夫妇开始化装成外地的生意人,租住在比较便宜的房子里,后来因为往来人员和物资增多,又化装成富商大亨。吴德峰要求周惠年从“佣人”做起,熟悉环境。一个在家乡参加过多次暴动的女战士,在一户有钱人家当保姆,成天洗衣做饭带孩子,虽然有时也会接待一些神秘人物,但周惠年还是感到很不适应。她向吴德峰请求调换工作,到革命的第一线做工工人运动,却受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吴德峰告诉她,不要小看这个“佣人”,一个家就是一个工作站,一个机关。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做家务的同时也要接待“客人”。吴德峰要求她必须假戏真做。周惠年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把这个“佣人”做得像模像样。

危难之际,毅然嫁给红队副队长

1931年4月27日,中央组织部领导找周惠年谈话,要她立即到中共特科工作,协助“红队”副队长谭忠余工作。当时,周惠年还不知道党中央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灾难。

两天前的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红队”队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且立即叛变。电报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特科成员)截获,立即派女婿刘纪夫连夜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报告了周恩来。面对如此紧急情况,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召集

陈赓、李强等有关人员开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了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审慎而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26日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搬了家,中央领导人也都转移到别处。在处理顾顺章的亲属时,周恩来想到了特科“红队”副队长谭忠余。谭忠余是特科“红队”的重要人物,这个棘手的行动离不开谭忠余与红队。但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是谭忠余的妻子。周恩来立即找张爱宝谈话,要她与顾顺章一家划清界限,谁知张爱宝又吵又闹,还说出威胁之语。周恩来又去找谭忠余谈话,让他断绝与顾顺章以及张爱宝的一切关系。谭忠余先有些犹豫,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表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命令。

随后周惠年就调进了特科行动科,也就是“红队”。周惠年成了一名特科“红队”的女队员,协助谭忠余工作。谭忠余安排周惠年仍然做秘密交通员。不久,周惠年就嫁给了谭忠余。从此,周惠年进入了上海党中央的核心部门。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赞扬周惠年是“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说明周恩来没有忘记周惠年在党危难之



周惠年

际所作出的贡献。

接下来处理顾顺章亲属时,谭忠余等人严格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把“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主要是亲属全部排列出来,因为这些人都在中共特科的外围工作,知道许多特科秘密。谭忠余带领“红队”队员对顾顺章的这些“重要关系”实施了有效的措施。

就在中组部找周惠年谈话的这天上午,顾顺章从武汉到达了南京,他一见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就表达了他很担忧上海的这些亲属,希望徐恩曾将这些亲属迁移到南京。徐恩曾立即派人去找,但迟了一步。顾顺章叛变后的第四天早晨,也就是4月28日,星期二,徐恩曾率领张冲(训练总干事)、顾建中(组织总干事)两员大将,亲临上海坐镇指挥大搜捕。他们会同上海警务司令部、租界巡捕房,共出动200多人的队伍,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进行了突击搜捕。令他们遗憾的是,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机关都已人去楼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转移。

谭忠余是个带有江湖义气的豪爽汉子。他与顾顺章同为上海宝山人,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北伐战争期间,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与顾顺章同是产业工人,也是老乡,所以二人过从甚密。谭忠余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康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中央特科成立后他就参加了特科行动科,做了顾顺章的助手。后与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结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几乎参与了特科所有惩治叛徒奸细以及国民党特务的行动。在执行任务时,谭忠余始终是丝毫不差地执行党中央决定,因此得到了周恩来的信任,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密切。谭忠余很少跟周惠年说起他在“红队”的行动,但有一件事,他跟周惠年说了,就是一年多前发生在上海的“东方第一大暗杀案”。这是谭忠余在惩治叛徒中最有影响的事件。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26.蒋介石被激怒了

西探长兰晋逊进来,盯了陈赓一眼,机械地翻着记录。随后又进来几个人,迅速地朝陈赓走了过来,把陈赓拖到电椅上。陈赓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关进了小号。他的衣服上,鞋上血迹斑斑。每动一下,身上的某个部位就痛。全身的血液在燃烧,两腿沉甸甸的,发木的舌头不听使唤。后来宋庆龄来探监,当局迫于压力,说要释放陈赓。但他们要了个花招,并没有释放陈赓,而是将其“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第二天押解去南京。

在南京没有审出结果,当局又将陈赓押往南昌:蒋介石行营。押解船自长江到达九江,又改乘铁路专车,到达南昌。陈赓被带进当年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过了两天,蒋介石的秘书邓文仪带着礼物,来看陈赓。他是陈赓的湘乡老乡,黄埔一期同窗。又适逢他荣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科长。他一进屋,就把自己刚刚印行的《青年战争革命》小册子,拱手递给陈赓。

陈赓笑笑:“喏,你还有时间舞文弄墨。”他随便翻了几页,念道,“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限期剿灭各地赤匪……”他丢下书本,责问道,“你所说的‘统一中国’,是否包括东三省?”“当然,当然。”

“既然包括在内,为何南京政府对东三省毫无动静,让日寇宰割?”邓文仪不语。邓文仪号称是国民党复兴社三大理论家之一,又自称是“第一个受俄国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他的脸刮得光光的,虽然理亏,嘴角却保留着一丝微笑,说:“现在是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今后要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蒋委员长如此器重你,你何不重整旗鼓,再展宏图呢?”

陈赓说:“邓文仪,老话说捆绑不成夫妻,你干吗要把我往你身上拉?我是共产党的人,死了也不进你们蒋家牌位。”邓文仪十分尴尬,转身走了。

第二天,邓文仪又来了。他说道:“校长要见我,我领你去吧。”陈赓坐在沙发上。邓文仪上楼不多时,就听得楼梯上传来笃笃的皮鞋声。他熟悉这声音。他当侍从参谋时,多次起身迎接过这种皮鞋声。可现在他坐着,不肯动一下,用报纸遮住脸。

皮鞋声在五步之遥停顿了一下,又重新响起,并伴随着浙江高腔响起:“陈赓在哪里?陈赓在哪里?”没有回答。“哎呀,你怎么弄成这种样子?”蒋介石说着。

“你把我拉来干什么?”陈赓喘着粗气说。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孔夫子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个个能同心同德,替圣人传经布道,可你们这些黄埔学生,哎……你在徐向前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陈赓摸摸满脸长须:“马马虎虎。”“周恩来总是跟我作对,现在又伙同朱德在江西同我捣乱……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中国不能这样沦陷……”

“这还用你表白吗?谁造成这种局面,中国人心里都有数。难道发动内战的责任还要我们共产党人来负吗?”

“你还年轻,前途远大。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劝你还是想开点。”蒋介石说,“我看这样吧,你还回来带兵,指挥哪一个师都可以。”

“指挥‘国军’打红军?”陈赓透过镜片不无讥讽地瞅着蒋介石。“你觉得不妥,可以到第三军去当参谋长,或者回南京当卫戍司令。”

“躲在幕后杀我们的人?”“你不要这个态度!”蒋介石被激怒了,眼神固执,动作僵硬,脸呈病态的铁青色。他挥了挥手,说,“我和你父亲是同辈,在外面,我就是你的父亲,你要听我的话!”

“哼,父亲?”在陈赓英俊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痛苦同时是火辣辣的冷笑,他愤怒地磨动着颌骨。“我家破人亡,父亲两次入狱,到现在生死不明;家产被你们讹诈一空,母亲和弟弟流离失所……你还有脸自称父亲!”

正巧有个军官进来,蒋介石忙对邓文仪说:“你好好劝劝他。”陈赓站起来要走。蒋介石回头瞥了他一眼,又把手背到背后,说:“以后邓文仪代表我同你谈。”蒋介石上楼去了。

3.我感到茫然了

这时,我的心情勉强止跌回稳,在密云不雨当中,看到一丝丝希望。可是,当我再问:“如果不是炎症,而是肿瘤,那会是什么状况?”医生摇摇头,顿了顿,才慢腾腾地说:“现在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都不好,我看我们还是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先去做个腹部穿刺,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满怀希望却被浇了一头冷水,有点泄气。但没过一会儿,我再度提醒我自己,癌症患者所需要的就是信心和勇气,过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迎刃而解,这一回,无论如何我都要相信身体可以陪我挺过这一关。

可是,等到做腹部穿刺检查时,我的信心马上又溃散了一地,简直无法收拾。他们先给我看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针,告诉我要先用一根中空的针管插到腹部定位,再向针管里插入一根细针,去抽取肿瘤里的细胞组织。因为我的肿瘤都长在肠系膜里,肿瘤是软的,包裹着它的肠系膜也是软的,里面还有很多液体,针管一戳它就会移动,需要先照CT定位。此外,做穿刺时我还必须保持不动,不然就有可能戳到别的地方,功亏一篑。

尽管打了局部麻醉,但眼睁睁看着一根长针慢慢扎进肚子里,那种心理冲击还真是恐怖,况且我前前后后总共做了二十几次,医生累得满头大汗,我也被搞得精疲力竭。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的信心是很坚定的,我也不断提醒年轻朋友,信心坚定是多么重要!我从来都不知道,当身体受到病痛威胁和折磨时,过去用理性头脑堆积起来的信心完全帮不上忙!我只想逃,或者闭上眼睛试图闪躲,甚至也会呼天喊地,大声哀叫。后来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这种出于身体的本能反应,其实是生命的自我防御系统。只是我习惯用意志力控制一切,病中才发现,身体对疼痛的反应竟然有我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生命里是否还有更多的神秘领域,也是我无法探知,无法控制的呢?我也感到茫然了。

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绪漫飞。一会儿想到我不得不暂停的工作,一会儿又想到创新工场满怀壮志为创业者付出的同

事……想想才隔多久,我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仿佛被禁闭在一间玻璃屋里,虽然可以看到,听到外面的世界,但那个活色生香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属于我。

想到母亲与家人,我为自己亏欠他们太多而感到难过。我的母亲已经九十几岁高龄,我是她老来得子的么儿,她一向把我捧在手心里,可是我自11岁到美国当小留学生,及至少

壮之龄工作、创业,除了短暂的假期能回家陪陪她,大部分时候都是远走他乡,让她年年为我倚门望望……黑暗中,我禁不住悲从中来。

生死哲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指出,人在面对疾病、死亡、悲伤等重大失落时,会产生“五个阶段”的心理反应——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在确诊淋巴瘤之前,我的心情分分秒秒都在煎熬那几个阶段翻腾。我痛责老天、天天上网笔战结仇,借着针砭时弊宣泄自己无所适从的惶恐和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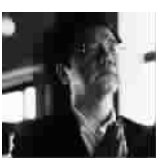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一次又一次在脑海里反复搜索答案。是北京的雾霾吗?是微软官期间我的心理压力太大?还是我长期过于讲究时间效率造成的精神紧张?或者,是我从小就争强好胜的个性导致细胞不安?

那20多个淋巴瘤肿瘤,吸足了化验试剂里的糖分,宛如闪闪发光的小鸡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的心情跌至谷底,久久不能平复。

等到我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过去没日没夜地拼搏,把身体拖进了恶疾的深渊,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跟神明讨价还价,不断向上帝、菩萨、诸神祈求:“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让这场病赶快过去,我一定痛改前非,尽力弥补……”我虔诚地祈求上苍,只要让我躲开癌症,我绝对早睡早起,改过向上。若是真的躲不了,也请让我的病情减轻些,给我机会重返生活,弥补过去的缺憾,包括对母亲、对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亏欠。

对于死亡,我完全没做好准备。我还有雄心壮志,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我求生的意志无比强烈,只要有一丝存活下来的希望,我绝不放弃。只是,真的能闯过这一关吗?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向死而生



李开复

我修的死亡学分